

蘇聯  
文藝  
論集

阿瑪卓夫等著 荒燕譯

十五年代出版發行

蘇

聯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書章

論集

黃真譯

# 蘇聯文藝論集

著者 阿瑪卓夫等

譯者 荒 燕

發行人 金 長 佑

發行所 五十年代出版社

北平崇內大街七五號

印刷者 五十年代出版社

印 刷 廠

北平崇內大街七五號

定 價 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初版

一——二〇〇〇（總）

# 目 錄

論文學的傾向性	一
論文學的自由	二三
蘇聯文學諸問題	四五
高爾基的美學	五七
論法捷耶夫	七三
論格羅斯曼	九一
論濟菲洛夫	一〇三
論蕭洛霍夫	一一五
莎士比亞在俄國	一三九
後記	一五七

## 論文學的傾向性

文學中的傾向性絕不是純粹的學理上的問題。這一問題引起了許多作家和批評家的注意，而且對於解決藝術創造上的諸問題具有意義，它關聯着藝術的性質、題材的選擇和表現的方法。有許多作家和批評家認為，藝術應該是「自由的」，「純粹的」，應該為表達作者的情感而服務，應該成爲一種美學上的許多美的形式的結合體。另外的見解則認爲藝術，當它力求以藝術的形式來反映美的時候，是不能超越人生的；它的主題應該是激勵羣衆的那種思想和情感。後一種見解常常被指爲「有傾向的」，因爲它引導我們去表現一定的藝術傾向，去肯定一定的倫理的和道德的觀念，或者去提倡一定的社會原理。

固守這種觀點的作家們，遭受到「純粹」藝術的擁護者們的猛烈的攻擊。特別是蘇聯文學，常被指摘爲帶有社會傾向——在有些外國批評家的眼裏，這種傾向是被認爲蘇聯文學中的主要缺點。這也就是俄僑格列布司圖夫在他的「二十五年來的蘇聯文學」一書中，以及陽珂萊夫林（Yanko Lavrin）在他的「蘇聯小說介紹」一書中所表現的意見。泰晤士報的文學副刊在它的許多書評中也加入了合唱，於是我們在鮑拉（Bowra）

寫的許多論評中發現了同樣的見解。「變化」(Transformation)雜誌的編者西曼斯基(Shimanski)，在責備蘇聯文學的傾向性這點上，特別固執。我們檢查這些人們的作品時，得到這樣的結論，即是不管作者們之間個別的差異，以及他們在許多問題上的不同的看法，他們的攻擊是基於一個明確的論點，根源於唯心論的美學。因此，要討論本題，非得檢討一下一般的文學原理不可。

有一種時興的信念，認為藝術除了它的形式美之外，別無其他目的。抱持這種意見的有戈吉葉(Gautier)，他讚美波特萊耳(Baudelaire)，因為波氏主張「藝術的絕對獨立」，並且否認詩在它的本身之外，能有任何目的，或者除了在讀者的靈魂中引起「就美字的絕對意義而言的一種美感」以外，還有任何任務。這種觀點的來源是哲學上的唯心論，特別是康德(Kant)的美學，他斷言美感的基礎，就是一種包含在純粹形式之內的毫無偏私的愉快。

戈吉葉認為真正的詩不僅不證明什麼，甚至連一個要敘述的故事都沒有。他認為一首詩的美，在於它的音樂和節奏，而不在于它的內容。這種觀點就是說，凡是表現一種思想的藝術作品，都是有傾向的。戈吉葉提倡了「純藝術」，反對傾向性的人，今天仍舊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信徒。

我極力否認「純」藝術的存在；「純」藝術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任何藝術作品總要敘述一個故事，或者描寫什麼。它的材料，要麼是藝術家的身外世界，要麼是他的內心經驗；不管他的題材是什麼，他必須照着他所看見的去反映事物。更進一步：如果那位

散文作家的或者那位詩人的描寫，跟我們自己對於事物的概念相融合，則我們把他叫做客觀的作家。如果他的描寫跟我們的概念不同，我們叫他主觀的作家。不管是在哪一種情形之下，我們所接觸的那位藝術家，對於世界現象有其自己的看法，這一點是絕無例外的。一位作家一定有自己的尺度，用以估計他周遭的世界。

巴爾扎克 (Balzac) 在「人間喜劇」的序文中寫下如下的話：「作家的法律，就是使他成爲一個作家的那種東西，就是使他——我大胆地說——等於或者高於一個政治家的那種東西，那種法律就是他對於人生諸問題的判斷，以及他對於原則的堅持。」巴爾扎克引譚鮑納 (Bonald) 的話說：「作家對於道德和政治必須有一定的見解，他必須把他自己看做一個教育家」。「人間喜劇」的作者進而說到他自己：「這幾句話成爲君主主義作家的法律，同樣也成爲民主主義作家的法律。我早就把它們當作我的法規。」利奧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也持有大體相同的見解。一九〇八年托爾斯泰寫信給安得菜也夫 (Leonid Andreyev) 說：「我相信，一個人只有在他所要表現的思想變得如此地頑強，以致不把它好好地寫下來，就不能安心的時候，才應該動筆去寫。」托爾斯泰和巴爾扎克一樣，覺得文學創作，跟某些一定的思想的表现，有着明確的連繫。這兩位作家的觀點是極有價值的，因爲它表現了近代兩位最偉大的文學大師對於藝術性質的見解。如果信奉純藝術的人一定要說，只有馬克思主義者才要求藝術的傾向性，那麼他得首先考慮考慮這兩位作家的意見。他們非但不能被指爲馬克思主義者，而且他們之有資格在藝術性質上表示意見，也是不成問題的。

也許有人會爭辯說，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的見解，僅只有效於他們自己的以及他們的信徒們的作品。可是對於那些不僅有意否認傾向性，並且連一切內容都要否認的作家們，又該怎樣呢？

戈吉葉有一次說過：「只要我能看看一張拉斐爾（Raphael）的畫，或者一張裸體美人，就是放棄了我的作爲法國公民的權利，我也樂意。」現代的詩人和批評家中，並不是沒有戈吉葉的門徒。這些人們之漠視政治，也構成一種明確的傾向，雖然他們強烈地反對傾向性。

我們可以給這種傾向，下一個更精確的定義。蒲列汗諾夫（Plekhanov）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每到藝術家無法苟同於他所置身的社會環境時，爲藝術而藝術的論爭就出現了。在一篇題名叫「藝術與社會生活」的文章中，蒲列汗諾夫把十九世紀前半期的浪漫主義，當作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的一種美學上的抗議。

現代的唯美主義者們同樣地不滿於他們的環境。不過他們對於現代生活方式的不滿，是和他們對於社會主義者必須改革社會制度的論題所抱持的消極態度，連在一起的。和浪漫主義者們一樣，現代的唯美主義者們很願意改變他們所處的社會條件，而不改變社會制度。因此，在這班詩人和作家方面，才有藝術的社會題材的否定，才有藝術形式的心理問題的偏執。社會題材的否定，形成了這一派別所遵循的一種清晰明確的傾向。分析到最後，攻擊傾向的作家和批評家們，他們自己却深深地陷入於一種特定的傾向的陷阱裏去了。

蘇聯文學特別受到傾向性的指摘。有些批評家們進而宣稱，傾向性是蘇聯文學所固有的一種性質。照我看來，如果我們按照前面所下的定義來解釋傾向性，那麼我就不難證明，所有的英國文學，古典以及現代的，都是有傾向的。用不着挖掘古代的東西來證明這一點。我們可以拿莎士比亞為例。莎士比亞的全部藝術，後來就會被人稱爲人文主義的復興思潮的表現，這一事實，姑且不去說它。任何人都應該認清的是莎士比亞的史劇不僅帶有傾向，並且還是直接的政治宣傳。想想看，在戰時法康卜瑞支說的那幾句話，曾被引用過多少次。

這個英國從不會，也永不會

躺了一個驕傲的征服者底腳下

讓全世界來進攻吧，

我們會嚇壞他們。誰都不能使我們垂頭喪氣，

如果英國信賴自己。

回想一下一九四四年出版的納伊特（Wilson Knight）的「橄欖和刀」。它証明了莎士比亞許多作品的愛國宣傳的性質。

班章生（Ben Jonson）可以說是歐洲第一位文學傾向的理論家。在「皆大歡喜」

的引導中，他說明他的目的，就是要「表現時代的形象，並且嘲笑人類的愚蠢」。在「伏爾邦」的序文中，他宣稱：「我努力去修改它們，加強它們的教育意義，不僅改正了舊的形式，並且改正了佈景的手法，以及文體上的流利，貼切，樸實的程度，最後，還改正了作為詩歌之主要目的的理論，藉以啓示具有最高度的理性生活的人們。」

沒有什麼人會否認米爾頓 (Milton) 和本寧 (Bunyan) 的作品，較之莎士比亞和班章生的，帶有更多的傾向性。

十八世紀的全部英國小說都充滿了道德的傾向。笛浮 (Defoe)，斯威孚特 (Swift)，瑞查生 (Richardson)，費爾丁 (Fielding)，斯沫策特 (Smolter)，戈德斯密 (Goldsmith)，全都是有意的小說家，雖則各不相同。道德觀點在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中，都被當作一種必要的因素。至於十八世紀的詩歌，戲劇和小說，一樣地充滿了傾向性。浪漫主義者發動一個反抗十八世紀的觀念的運動，但他們用另一套理論代替了前一個時代的那些理論，可是這些理論裏面含有同樣多的傾向性。這一點，只要我們看看華茲 (Wordsworth) 的抒情詩集序言，我們立時就可以看出來。他說：「我相信，沈思的習慣，提高了並且調節了我的情感，因而你可以發現我所描寫的，那些強烈地刺激了我的情感的事物，都帶有一種目的。如果這種意見是錯誤的，那我就沒有資格去作一位詩人……讀者的理解力必須要啓迪到某種程度，而他的愛心，也必須要加強和淨化。」

我們不討論拜倫 (Byron) 和雪萊 (Shelley)，因為自色薩 (Southey) 和傑弗雷 (Jeffrey) 的時代以來，它們就時常被指為帶有傾向，所以我們勿須在它們的作品中指

出這一性質了。

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和詩，繼續帶着前輩的傾向性，像我們在創造了現代社會小說的狄更斯 (Dickens) 和撒克萊 (Thackeray) 和他們的信徒們的作品中所見的。在卡沙紹 (Casaman) 的「英國的小說和思想」一書中，讀者會發現一個極有趣的敘述，闡明了維多利亞時代小說家們的社會思想和傾向。我們相信，在狄更斯的時代，沒有一位俄國小說家會像「聖誕節的故事」，「艱苦的時代」或者「小杜立特」的作者那樣帶有傾向性。

世界詩壇上沒有誰的詩，在道德的傾向方面，能比上泰尼生 (Tennyson) 和卜朗寧 (Brownings) 的，如前拉菲爾派以及十九世紀末的唯美派批評家們所證明無遺的，因為，他們會責難過這兩位維多利亞時代的詩人帶有這種傾向。梅里遜斯 (Merivale) 和白特勒 (Butler) 發動了對維多利亞派的反抗，但是誰又能否認「生命的路」和「埃洛昂」裏的傾向性呢？

獲得世界聲譽的吉卜林 (Kipling)，蕭伯納 (Shaw) 和威爾士 (Wells) 的作品，全都是**一定主義**的直接宣傳。

我只提到這幾個名字，但是這幾個名字則是構成英國文學的光榮與偉大的人們。他們之中的每一位，都把一定的思想包納到他的作品裏去，而他們之中的大多數都公開地承認他們的傾向性。

對於這一問題的客觀而公正的把握，會使任何人相信，傾向性絕不是俄國文學所獨

有的特性。它是英國文學、美國的和法國的文學，以及任何國家的文學所通有的。認為傾向性是一種缺點的「純藝術」的信徒們，就必須否定莎士比亞，米爾頓，華滋華斯，拜倫，泰尼生，狄更斯，吉卜林，威爾士和蕭伯納。

實際上，唯美主義者把最接近他們的觀點的那些過去的作家們，和英國古典文學發展的路線對立了起來。對於他們，鄧（Donne）和哲理詩人是最重要的。我們發現他們強調了濟慈的唯美主義，並且從但丁羅色蒂（Dante G. Rossetti），克里士丁娜羅色蒂（Christina Rossetti）湯姆生以及英國的頹廢派的詩人們那裏，取得了愜意的見解。我們雖然無意於減那些詩人們的光輝，但是我們必須同意大多數人們的意見，他們是英國的第二流，而不是第一流的作家們。

各種各樣的唯美主義者們，熱心於討論他們所聲稱的，蘇聯文學中的一種「反藝術」的傾向。他們的目的不僅在打擊一般的傾向性的原則，而是在打擊構成蘇聯文學內容的民主思想。一般地說，信奉「純藝術」的人們，都是仇視社會主義思想的。公正的讀者們，如果檢討一下這些詩人和批評家的理論，就會發現他們不僅否認俄國文學和藝術價值，並且否認英國文學中一切最有意義的作品的價值。試想一下，例如，艾略特（T. S. Elliot）的一篇文章，力稱漢姆萊特是一個壞的劇本（見聖林集內的漢姆萊特諸問題）。我們十分懷疑那些討論蘇聯文學的藝術價值的詩人和批評家，因為他們之中的有些人們，竟連漢姆萊特的文學價值也要否認。在我想來，那些人們標明了一種「反藝術」的傾向，不管他們用關於美麗和必須恢復美感之類的廢話，把那種傾向遮掩得多麼緊密。

## 三

人們費盡心力，要去證明俄國文學，是一種和西歐文學顯然不同的現象，而且要去證明，把西歐文學和蘇聯時代的俄國文學一相比照，就達到了二者的對立。還有些批評家，努力在俄國文學的四週，佈下一種人爲的孤立氛圍。然而每個人都知道，俄國文學的古典作品，在別的國家的每一種新文學思潮裏，都受到深刻的注意。俄國文學隨時都反應到外國的每一種新的文學思想和形式裏去。

有些民族，在誇耀他們自己的文化時，總連帶地蔑視其他國家的文化，但是在俄國，這種情形是從來沒有的。早在一八三八年，俄國批評家柏林斯基寫過：「成爲德國人並不比成爲法國人更合適，因爲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奔騰澎湃的民族文化；雖然如此，俄國的命運是注定了要去吸收所有的世界生活的要素，且不說歐洲的了。我們俄國人，不僅是歐洲生活，並且是整個世界生活的承繼者；還有，我們是合法的繼承者……我們把構成歐洲各民族的特點的一切，拿來當作我們自己的東西；我們把它拿來，不是當作一種特點，而是作爲加到我們生活上的一種因素，我們的生活的特徵應該就是它的多樣性。……」

杜斯退益夫斯基深信俄國人的同情心普及於全人類，不分國家，血統或地域。一八七六年他寫道：「俄國人比德國人更爲愛好，並且更能欣賞莎士比亞，拜倫，司各脫（Scott）和狄更斯。俄國跟世界文學的這種關係，在別的民族中，是得未曾有的。」

蘇聯文化承繼了這個傳統，並且隨着他們更向前發展了一步。蘇聯在文化領域裏第一樁事業，就是高爾基所倡議的，建立世界文學出版局。這是一九一九，那個困難的年的事。從那以後，關於這方面，作了許多工作，其中包括發行數百萬份的，世界古典文學的出版事業。蘇聯劇院的節目單上包括了世界戲劇的主要作品，如莎士比亞，索福克里斯，(Sophocles) 味嘉 (Vega)，考德昂 (Calderon)，莫里哀 (Moliere)，謝賴登 (Sheridan)，哥德斯密，席勒 (Schiller)，雨果 (Hugo)，易卜生 (Ibsen)，蕭伯納等人的傑作；近代的劇作家像奧尼爾 (O'Neil)，毛姆 (Maughan)，卜里斯特里 (Priestley) 和愛爾門 (Hellman)，在俄國劇壇上也有他們的地位。

自然，俄國文學有它自己的民族的和歷史的特點。使得英國文學和法國文學不同，德國文學和德國文學不同的，也正是這種民族的和歷史的特點。每一種文學都有它自己的民族特性，這是一種明顯的，基本的事實。然而，要不是存心抹煞這種事實的批評家，絕不會把俄國文學表現為跟歐洲文學完全異趣的某種東西的。

俄國和西方之間，經常存在着相當的連繫；而精神上的結合，在最近的一百五十年中，發展到與日俱進的程度。俄國作家們受到西方作家們的影響，並且，轉過來，也影響了他們。從上世紀的後半期開始，俄國文學一直是歐洲文學的不可或缺部份，並且佔着顯著的地位。單是托爾斯泰和杜斯退益夫斯基兩個人的名字，就足以證明，不管你研究歐洲文學發展的那一部份，俄國文學是撇不開的。在更晚一點的時期中，柴霍夫和高爾基在歐洲文學中代替了他們的地位，還有卜洛克和馬雅可夫斯基也是如此，他們通

過翻譯，被介紹到歐洲讀者們的面前。

不要以為我扯得離題太遠。我們把世界文學發展的統一性建立起來，使我們不再置疑於傾向性不是一個純粹的民族性問題，這是非常重要的。傾向性是英國的，法國的，美國的，俄國的以及任何別的文學，在同等的程度上，所共有的。

對於傾向性的性質的誤解，常常引導我們對於最重要的文學現象作了不正確的評價。下面是西蒙斯教授的「現代俄國文學大綱」中的結論，我們引來作例：

「人們常常誇張地強調了俄國文學的所謂「傾向的」性質。它的傾向性與其說存在於想像豐富的偉大作家的實際工作中，還不如說是存在於俄國職業批評家的思想和要求中。一個可驚的事實是，俄國小說的黃金時代的著名小說家們都擺脫了有傾向的主題。岡察諾夫 (Goncharov)，杜斯退益夫斯基，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列斯可夫 (Leskov) 大部份都耕種着他們自己的藝術園地，並不左轉右轉，以滿足批評家們的社會要求。著名的小說如阿卜羅莫夫，貴族之家，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卡拉瑪卓夫兄弟們都是非常自由，不受傾向性的拘束的。」

事實上，西蒙斯教授所提起的那些書，是屬於公開宣傳傾向的文學作品之列的；我敢說它們是俄國古典文學中最帶有傾向性的！

阿卜羅莫夫是一部批評貴族的寄生主義，和讚頌積極生活態度的小說。貴族之家是對於不可救藥的貴族文化之崩潰的輓歌。戰爭與和平是一幅偉大的愛國戰爭的全景，歌頌着俄國人民，並且描繪着俄國貴族的知識份子的精華，如何探討生命的意義。安娜卡

列尼娜鮮明地描繪了貴族的和布爾喬亞的社會裏，一個家庭的解體。卡拉瑪卓夫兄弟們充滿了基督教的道德教訓。這些作品的著者們從不掩飾他們的傾向。西蒙斯教授努力要把他們從這種意向裏解放出來，可謂枉費心機了。

一個客觀的考察者底任務，不是在譴責傾向的聲討中，來為文學辯護，而是要去檢討傾向的性質，要去瞭解並解釋，在藝術創造上，傾向性和客觀性的關係，作者各種思想的互相倚賴與關係，以及它們之間的矛盾，還有文學作品中描寫生活的客觀性。最後，我們必須估計各種傾向對於作品的生命力與藝術力量的影響。

高爾基認為文學是最常用的傳播思想的工具。「把思想用血肉裝扮起來，它就獲得比哲學或科學更廣泛而普遍的感召與說服力量。」同時高爾基指出：「赤裸裸的思想，有着邏輯上的連繫的，文法正確的句子，是不夠成為小說的。小說所需要的人物，是具有一切的心理錯綜的，像在現實社會中，那些本質上就混亂矛盾的人物一樣。」高爾基又指出：「小說家要比他的傾向更為廣博，為了獲得更大的說服力，他必須把他所擁護的思想，和他所仇視的思想並列起來。這樣，小說家便告訴我們，縱然出之以歪曲的形象，他所仇視的是什麼了。」

恩格斯在給明娜考茨基(Minna Kautsky)的信裏，對於傾向性表示了有趣的意見。在談到她的小說「舊的和新的」的時候，恩格斯說，他絕不反對帶有傾向的詩。他指出悲劇之父的艾斯齊拉斯(Aeschylus)和喜劇之父的阿里斯托芬尼斯(Aristophanes)，和但丁與賽萬提斯(Cervantes)一樣，都是確切不移地帶有傾向的詩人。恩格斯說，十九

世紀下半期的挪威，和俄國的作家們，「創造了很多光輝的小說，全都是帶有傾向的。」然而恩格斯是反對拙劣的傾向性的。傾向，他認為，不能勉強加於讀者，必須自然而然地從作品的佈局和動作中產生出來。在他寫給英國女作家哈克尼斯小姐（Miss Harkness）的一封信中，他又一次談到傾向性。他說：

「我絕不吹毛求疵，怪你沒有寫一本眩示作者的社會與政治見解的，鐵金的社會主義小說，也就是我們德國人所謂的『傾向小說』。那絕不是我的意思。作者的意見越是深藏不露，對於藝術品的益處也越大。」

恩格斯認為，在有些作品中，不管作者的觀點如何，它的現實性是可以感覺得到的。他舉巴爾札克的「人間喜劇」作為例證。

「巴爾札克在政治上是一個正統派；他的偉大的作品對於那不可救藥的上流社會的沒落，是一首輓歌；他是同情那個注定要被消滅的階級的。然而，儘管如此，當他處理他所深為同情的那些人——貴族們——時，他的譏諷是無比地鋒利，他的嘲笑是無比的尖刻。而他所敬佩的人們，反而是他在政治上的死對頭，共和運動的英雄們，在當時（一八三〇至三六）他們的確是代表大眾的。就這樣，巴爾札克不得不違反他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成見，他看出他所偏愛的貴族們之沒落的必然性，而把他們描寫為罪有應得的人們；他看見了，就當時來說，屬於未來的正真的人物——這點，我認為是現實主義的偉大勝利，也是老巴爾札克的一大特色。」

所以我們可以講到兩種傾向：作者的傾向和生活本身發展的傾向。實際上，這一問